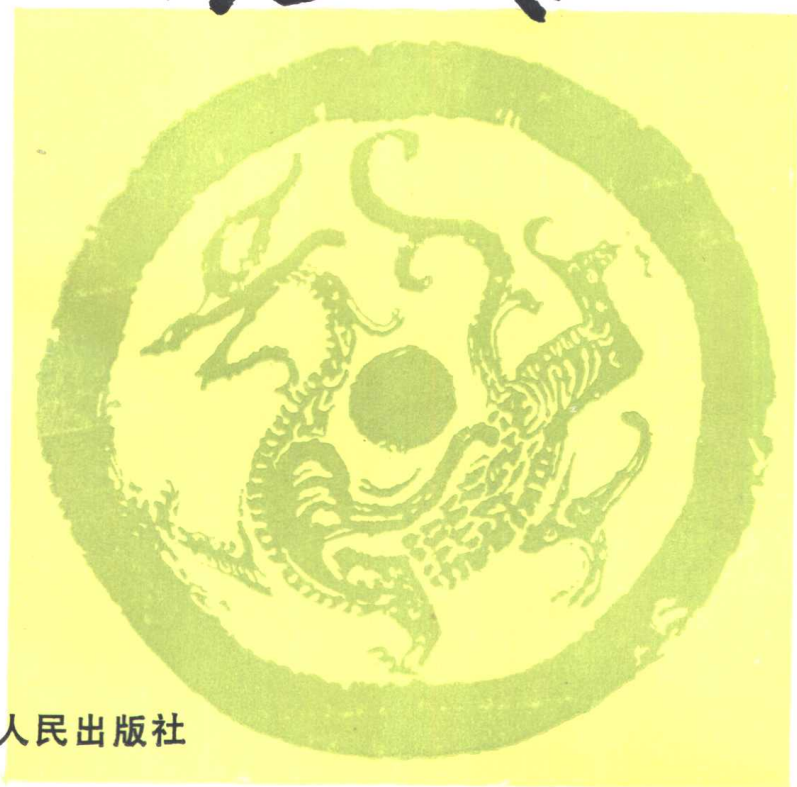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中国历代名侠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中国历代名侠

主编 吴绍钊 王文彬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曲月胜

技术设计：崔昌珠

中国历代名侠

(朝鲜文)

吴少钊 王文斌 主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延边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延边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7.375印张 148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ISEN7-80508-898-5/K·43

印数：1—4,730册 定价：4.40元

中国历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主 编	吴绍钊	王文彬
副主编	郑淑慧	陈维新
编 委	潘颂德	卞良君
	史云谋	李中庆
	刘忠林	鞠胤中
	姜国学	宋延文
	刘建民	

序

据有史可考的华夏文明，已经垂五千年。先人或居或作，以自己卓然不群的言行，推动了这个文明的创造，终于使这个泱泱大国，以其不可动摇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建设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个巨大的存在。

在漫长的岁月里，先人所生长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虽然有它有利的一面，然而也有它极为不利的一面，大量贫瘠的土地有待耕耘，洪水的泛滥有待疏导，原始的生产方式只提供了极为有限的物质财富，长期的小生产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可能使生产力获得飞跃式的解放，相反，它限制了人们的视野，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限制了人们参与文明建设的活动能力。历史上专制政体的高压政策，箝制着人们的思想，限制着人们的活动，封闭着人们的自由心灵，而后者，正是一个民族飞跃发展的前提。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也一度加剧历史的曲折性，因此，鲁迅曾说“中国历史上满是血痕。”

然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总是相辅相成的。人类绝不是首先从天然环境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的和异常严峻的自然选择性，成为促使森林古猿种群分化并从中派生出人类的主要原因。”（陈恩志《中国与南亚人类起源中心说》载《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历史的曲折性的负面，严峻的高压政策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会产生出一种巨大的正面

• 1 •

力量，相磨相砺相激荡中使得人容易获得认识自己的可能性，容易获得自我肯定、自我解放的可能性，从而使自己成为不但战胜客观环境也战胜自己的大写的“人”。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又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是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这些“中国的脊梁”，在时间上绵延不绝，在空间上分布在各个领域。或以其临危不惧，舍身援命，以殉真理而赢得了后人的肃然起敬；或以其深邃的思想，洞烛幽隐的眼光，过人的睿智，使后人钦佩不已；或以其卓特的天赋，盖世的才艺，独领风骚的创造，使后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或以其奇行奇事，惊世骇俗，一往情深，使后人的灵魂受到震惊和陶冶，……这些华夏民族或一方面的代表，受着民族文化的哺育，而又创造着民族文化。

要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不能不了解中国的昨天。而昨天的中国，也决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华夏民族有过辉煌过去，如秦皇汉武的赫赫威仪，唐宗宋祖的文采风流，但是，历史是一种个体创造物的积聚，没有个体，也就没有群体。历史上被当代人和后人奉为楷模或传诵千古的个体，也就是所谓名人，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结晶体。

吴绍钊、王文彬等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以其壮阔的规模，穷搜旁及的材料，为我们展示了华

夏文化的精英。一编在手，尽窥全豹。可以预期，这套《丛书》将不胫而走，在读书界将赢得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陈晔树

1992年7月18日
于上海复旦大学



侠文化：侠的发展轨迹与行侠的类型

（代前言）

侠是中国平民大众心目中最敬慕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是纷乱的世俗风尘中的强者典型。侠不是受欺凌，受压迫的弱民们幻想或臆造的人世英雄，而确确实实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原壤中孕育出来的“赖力仗义”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

侠的名称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国民养儒侠，难至用介士”。在古代中国，侠兴盛于战国时期并非是偶然的。此时的社会形态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列国争雄使得社会急剧动荡，频繁战争与动乱的风烟弥漫了尘世，给人民带来了苦难。恃强凌弱、滥肆杀戮的残酷现实令许多大智者深思，以何种方式解救万民于苦难之中。纷乱的社会活跃了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陡然使得许多大智者幡然觉醒。他们以各自的学说和思想标新立异，并身体力行，实践于世。变革时代引来的百家争鸣使得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以人为本”的思潮。当时各家学说妙义层出，象管仲的“以人为本”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荀子的“节用爱民”思想，孟子的“民为贵”思想等，皆堪为是真知灼见，各有千秋。当时学说众多，但对侠的兴起影响最大的是墨家学派（尽管此时尚未提

出侠的概念)。墨子分析了当时社会祸乱的根源在于人们相互间的失和与不相爱。他认为世人应该消除仇恨怨怒，让人世充满爱，人活在世上要设身处地多为他人着想，要有推人及己的精神，只有这样，人世才能摆脱苦难，进入一个理想的境界。正是出于这种思考，墨子提出了“兼爱”，“利人”的改造社会的主张。这是一种带有鲜明的古典人道主义特色的思想，围绕这种思想，墨子又提出了许多具体原则，如他所提倡的“杀己以存天下”，“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万事莫贵于义”，“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等道德信条和行动目标，都对侠的兴起有影响，并成为后来侠士们的道德信条和人格理想的具体标准。为了实现这种社会理想，不仅墨子身体力行，而且墨家弟子也努力实践，他们“役身给使，不敢问欲”，注重技能训练，崇武尚义，赖力救弱，成人所急，不畏生死。墨家弟子高尚的人格令世人敬仰。故《淮南子·泰族训》中盛赞墨家弟子“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后世的人们正鉴于此，称墨家子弟为“墨侠”。当然侠与“墨侠”都具有“崇义助弱”的精神，但在理想目标上存在着差异，墨家的崇高的社会理想显然是侠客们所缺乏的。纷乱的社会自然会产生许多不平之事，保护自己，助弱惩恶的意识和活动，一旦为社会的许多人所认同，那将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反作用于世人。而一部分个性激烈者，由于他们的气质、情绪和思想的作用，就会把“赖力仗义”、“赖力助弱”作为自己生存于世的价值作用、实践于社会，而战国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思潮恰恰为这些个性者提供了活动的条件，他们或朝秦暮楚，或立身一方，以剑、刃作为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手段，于是产生了游侠和刺客

(侠)。他们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种特殊角色和力量开始活跃于历史的舞台上。

侠的出现使世人侧目以待。侠在初兴时的历史命运似乎还是不错的，但对它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好士任侠的战国四君子、燕丹子等出于政治的需要，不耻公门，礼贤下士，其中收揽了不少的侠士。《东坡志林》卷五中说：“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莫不肉食。……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七万家于薛”。养侠士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对于侠来说，择主而栖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捷径。无事时，衣食无忧；任用时，则能显名扬声。所以侠从一开始由于社会活动的方式也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作为一种能够独自存在的阶层，而是作为社会其他阶层的一种附属存在着、活动着。他们与“墨侠”注重各种技术训练，赖力而生是不同的，他们只是尚武、崇勇、信义，凭着剑、义、信，将自己生命价值的砝码附之于养主、恩人的天平上。所以先秦时的侠大都是刺客一类的。由于受到知遇之恩，侠士们在关键时刻，都能为养主、恩主竭忠尽力，不辱使命，甚或以牺牲自己来达到恩主的目标。四公子，燕丹子等招士养侠之举为秦汉侠士依附豪门权贵的生存方式提供了模式。

然而，到了战国后期，韩非子出于法家专制霸术思想的需要，竭力贬侠。他在《五蠹》篇中，将侠和儒都列为是败坏法制的蠹虫。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韩非的贬侠为后世的统治者禁侠提供了理论

依据。

秦始皇是给侠造成困境的第一人。在他兼并天下后，遂以客为无用，主张法制，任法而不任人，认为民可任法而治。出于专制统治的需要，他大杀包括侠在内的豪杰俊彦之士，致使这些民之秀异者，或散归于田亩，或隐匿于僻壤。然而，秦的统治是短暂的，它只是给侠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困境，而未给侠造成致命的打击。而造成侠失去活动在政治舞台的则是两汉的几位帝王。

汉兴之时，禁纲疏阔，在开国元勋之中不乏豪侠之士，故汉初养士之风仍很兴盛。《汉书·游侠传》中说，当时象代相陈豨、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等皆招宾客数千。当时的豪侠之士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觊而慕之”。侠的势力的增长和放肆无度已成为威胁政治统治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有些侠士们在吴楚七国之乱中被养主利用，为汉景帝诛侠提供了口实。周亚夫为太尉乘驿车到洛阳时，访得以任侠显名于诸侯的剧孟，把剧孟请到车中，与之结交，并很高兴地说：“吴楚举大事而不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并说得孟“若得一敌国”。可见，西汉初时，名侠的作用实在大矣！吴楚七国之乱，使汉景帝认识到侠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一旦与王公大臣结成势力，那将极大地威胁政治统治。鉴于这种认识，汉景帝开始对侠进行搜捕和诛除。《史记·游侠列传》说：“是时济南眭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这种政治形势使得汉初侠存在的两种方式，即立身一方，独立行侠和依附豪门而任侠，急剧地转向后者，因此，象当时的一些名侠，如郭解之类，都结好于公府

• 4 •

权门，以利于生存。汉武帝建元二年，武帝出于统治便利的需要，令徙郡国豪杰于茂陵时，大将军卫青曾亲自到武帝前为郭解说情。可见当时侠附权贵之门已成为侠生存的一种方式。然而武帝对侠的态度也是很明显的，堂堂大侠郭解不就是死于武帝统治之时吗？

在历史上，司马迁是肯定侠、赞赏侠的第一位大家。他的这种态度和感情可见之于《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以生彩之笔将先秦以来的名侠的传奇故事记叙下来，再现了历史上的这些名侠的侠义精神和音容笑貌，并在《游侠列传》中对侠和义侠精神作了初步的说明和界定：“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他还对侠的人格精神作了肯定。他说：“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在“太史公曰”中，他说：“天下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身，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对义侠的精神予以褒赞。然而，义侠精神毕竟与统治者的需要是相抵牾的。所以到了汉成帝时，排侠之风仍然很甚，永始、元延年间，长安令尹赏一次就坑杀了轻侠百人。王莽专政后，对侠也无好感，出于统治需要，也“尽诛豪侠”，《汉书》及其《游侠传》中有这方面的记载。

汉代统治者的排侠、诛侠使任侠之风呈现颓势，班固虽然继承了《史记》的精神和体例，也在《汉书》中开列了《游侠

传》，记载了剧孟、郭解、万章、陈遵、原涉等侠士的事迹，而且对汉代以来的侠的发展状况作了初步的勾勒。然而，自此以后，那些作正史的史家们再无司马迁、班固的胸襟和史识，在正史中再也未能能为侠列传了。随着汉代侠的多难的命运，侠不仅被排除于正史的记载，而且“侠士”自东汉后至唐前一直被排挤于政治舞台外，任侠之风也趋于衰弱。

隋末社会的动乱又使一批侠士活动于政治历史的舞台上。唐初的许多开国元勋正是隋末豪侠历经戎马生涯后的一种身份的转换。象李勣、杜伏威、公孙武达等人的侠义传说故事，自然会影晌世人对侠的观念的转换，激起人们对古代豪侠壮举的赞美和崇敬之情。初唐以来的边塞的战争卷起了人们到边塞从军，立功封侯的狂潮，是时“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少年重英侠”。对于唐人来说，从军边塞正是学习古代豪侠舍身取义的一种侠举。这种任侠意识标志着唐代侠士对传统任侠意识的超越，是侠士们自觉地将安邦定国作为任侠的一种义举。大量的唐代游侠诗说明了这一点。例如王维《陇头吟》写“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以此来刻画一位充满游侠豪气的长安少年渴望建立边功，跃跃欲试的壮志豪情。对于唐人来说。任侠是人生必备的一种美德，骆宾王一生充满着侠气，处处好打抱不平，陈子昂自幼受家庭影响，养成了豪侠浪漫的性格，李白“十五观奇书”、“十五游神仙”，同时还是一个“十五好剑术”的少年侠客，传说他曾为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初、盛唐的许多著名诗人都是侠气甚浓的豪客，足见当时任侠之风的昌炽。中、晚唐社会的动荡，使得任侠之风又趋成势。这种任侠意识体现在大量的传奇中。在唐传奇中，尽管有一部分是虚构的，

但有许多传奇却具有尚实的影子。因此像唐代传奇中的《谢小娥传》、《昆仑奴》、《虬髯客传》、《田彭郎》、《潘将军》都是体现侠义精神的著名传奇。也许中唐时的宰相李德裕有感于豪侠之精神诚可嘉扬，作了《豪侠论》。他对义侠们“赖力仗义”、赖力任侠的美德进行了阐释：“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

宋、元、明、清各朝创立前后，随着社会的动荡曾出现过一些侠士。然而，在唐后，真正形成任侠大观，以侠举震撼国人之心的时期是清末民国初。此时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从未象此时这样沉痛。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一些具有爱国、爱民族的豪客大侠以他们的侠举博得国人的赞扬。这是中国的任侠延续了二千多年后迎来的又一次高潮，此时名侠层出，他们的任侠精神再一次超越了前代，就象“夕阳无限好”一样，留给了人们美好的回忆。

从侠的发展轨迹，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的侠的风流与悲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至今，豪侠们的义侠精神和任侠故事始终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的心湖中激起巨澜，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料，成为“始终活在角色之中的中国人的某种心理补偿”。

中国古代的侠出现在社会的各阶层，如官侠、盗侠、僧侠、道侠，既有贵如战国四公子那样的“卿相之侠”，曹沫那样的“将门之侠”，还有象专诸、聂政、豫让、郭解、原涉那样的“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布衣之侠”。在古代，人们根据侠者任侠的方式和目的不同，赋予了侠者不同的称谓，诸如“游侠”，“义侠”、“豪侠”，“气侠”、“节侠”、“轻侠”、“武侠”、“剑侠”等等。而被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称

为“刺客”者，由于其行刺在本质内涵上是与任侠有着一致的精神，或是扶危济弱，剪恶锄暴，以“义”为主，只是最终以行刺作为其最高的外在表现形式，所以尽管侠与刺客有所区别，但由于在内涵、外延上具有交缘的特点，所以，我们还是将刺客列入侠的范畴。

从上述侠的发展轨迹可知，泱泱古老的中国，自战国以来名侠辈出。随着社会赋予侠士任侠的文化氛围、活动条件、国情民况，以及侠士们本身素质的不同，根据任侠的目的及产生的价值或效应，侠士大致可分为六种类型：

一、为了个人，家世的怨仇而行侠。如具有尚实性质的唐传奇《谢小娥》中的主人公谢小娥的行侠就属此类。这类行侠者意志弥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类侠士出自于社会各阶层，较多地接受了封建家庭意识和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他们的行侠过程是一种复仇意识的渲泻过程，是一种自行正义的私相图报。

二、为报知遇之恩，不惜为知己者而去慷慨行侠。如擘鱼藏匕刺王僚的专诸，独行仗剑除侠累、聂政，漆身吞炭刺襄子的豫让，图穷匕见刺秦王的荆轲等皆属此类侠。这类侠特别注重义、信、勇，一诺既出就置己之生死而不顾，甘愿为知己或恩主抛头颅、洒热血，这些人大都可称之为刺客或刺侠，他们的生命价值除了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外，往往成为知己者或恩主在达到目的过程中的牺牲品。这类侠者大都出身于乡曲、闾里，是象《燕丹子》中田光推荐荆轲时评价夏扶、宋意、武阳的那种“血勇之人”，“脉勇之人”，或“骨勇之人”，可统称之为“匹夫之侠”，而象荆轲那样“怒而不变”的“神勇”之侠实在不多，因而都是悲剧性的人物。

三、因嫉恶如仇，见义勇为，剪恶除暴，扶危济弱而行侠。如程婴为救赵氏孤儿，冒着被屠岸贾有可能诛杀的危险和牺牲己子的代价，凭着侠肝义胆倾心相助。骆宾王也属此类侠者，他在四川路见不平，慷慨地为弱女子郭氏“声讨”他的朋友卢照邻，为女道士王灵妃写诗“声讨”道士李荣，这都是“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的侠举。闻一多先生说骆宾王“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其行侠性质犹为鲜明。这类侠士较多地继承了“墨侠”“赖力助弱”的传统，无论是仗剑动武，还是以文行侠，其行侠心理皆为同情弱者，拯救弱者，抨击强者，制裁强者。

四、因为不堪忍受压迫而聚义行侠。如隋末唐初的窦建德，公孙武达，段志玄，杜伏威，李勣，宋代的宋江等，他们的行侠目的比较明确，是世纪末社会动乱中的冲击旧次序的强悍豪侠，由于他们的仗义行侠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更多的是为了平民大众，推翻腐朽王朝，所以他们的侠举轰动效应较大。这些聚义行侠的胜利者往往成为一代开国元勋，他们前半生是侠士，后半生则成为一朝重臣。极个别者成为一代天子。

五、为了安邦定国而行侠。这类侠士在国难当头之时，能主动请缨，以大智大勇使国家免遭涂炭，如与齐战三度败北的曹沫，在齐强鲁弱的情况下，在齐桓公与鲁庄公于柯地会盟之际，轻身与盟劫桓公，迫使“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这类大侠任侠的社会效应和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六、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而慷慨行侠。这在外族、外国势力入侵中国的猖狂之时，一些名侠不计个人安危，去主动行侠，象津门大侠霍元甲、南北大侠杜心五以及王子平、杨班

侯、杨剑霞等，他们凭借着盖世武功，勇挫劲敌，大灭了外夷之威风，大长了我中华人之志气，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他们的任侠的社会效应和价值，无疑应属最上乘。

本书反映的历代名侠，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史料有限，时间仓促，宋元明三代的名侠事迹未能予以反映，我们总觉得有所缺憾。另外，限于我们的学识水平。错误一定难免。博雅诸君，幸见教焉。本书在撰写的过程中，力图从历史的角度，用客观地反映、评价历史人物的笔法，揭示这些名侠的个性和心态。反映他们任侠的社会背景、动机及经过，以便展现这些名侠们任侠的风采。

名侠活跃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活跃在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名侠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古代的诗歌、传奇到现在的戏剧、影视，都可见到侠影秘踪，侠气回荡于其中。侠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侠之所以对中国人产生如此巨大的魅力，不仅因为一部侠史充满着悲患与风流，更重要的是，历代名侠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敬佩的强者典型之一。他们的侠骨壮山河，侠气荡乾坤。

本书以及《中国历代奇士》、《中国历代圣人》、《中国历代三绝》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延边大学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延边人民出版社曲月胜同志的支持，特别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理事会顾问，美国传记协会顾问的陈鸣树先生为本书作序，在此一并致谢！

吴绍钊

1992年8月20日